

關於內藤文庫所藏鈔本《章氏遺書》來歷之考證

陶 德 民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iable Manuscript of Zhang Shizhai's Writings kept in the Naito Library

Demin TAO

The reliable copy of Zhang Shizhai's (1738-1801) writings bought by Naito Konan (1866-1934) in 1919 from the *Rakuzendo shoyakubo* in Shanghai made it possible for Naito to compile his renowned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Zhang's life for publication in the newly initiated journal *Shinagaku* in late 1920. Both of Hu Shih and Yao Mingda highly evaluated the manuscript before and even after several printed versions of Zhang's writings appeared in 1921 and 1922. The present article, based on a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related materials,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manuscript was made by Shen Xiayi (1779-1850), Zhang's fellow townsman and a prominent book collector, and kept by Zhang's clansmen Zhang Xiaoya and Zhang Shiqing with the help of Xiao Mu (1834-1904), a dedicated documentalist and an admirer of Zhang, and that the manuscript was made by the order in fall 1896 of Sun Wenqing (1861-1918), the Presented Scholar of 1889 and a rich book collector, and the copying work by a group of *Xiucan* including the promising young scholar Jin Xingxiang (1878-1941), was completed in the beginning of 1897.

キーワード：鈔本章氏遺書、內藤湖南、沈霞西、蕭穆、孫問清、金興祥、
胡適、姚名達、張爾田

關西大學的前身為1886年（明治19年）創立於大阪市內的「關西法律學校」。1986年百年校慶時，作為紀念事業的主要舉措，在興建莊嚴雄偉的百年紀念會館和綜合圖書館的同時，購入了價值連城的內藤文庫以及內藤晚年居住的恭仁山莊，而鈔本《章氏遺書》可以說是其中的鎮庫之寶。¹⁾

1) 長期以來，校方、圖書館長、司書和文學部教授致力於引進珍貴文獻，形成了一個頗有特色的文庫群，其中與儒學和中國相關的文庫還有泊園文庫（1825年至1948年存立於大阪市內的泊園書院的藏書。泊園是關西大學文科的前身，現任泊園紀念會會長是以朱子學和禮學研究著稱的吾妻重二教授）、玄武洞文庫（師從幕末大阪諸儒并自成一家的田結莊金治收集的數百種孝經版本及相關書籍）、長澤文庫（日本的目錄學泰斗長澤規矩也的中國文學及書誌學相關藏書）、中村幸彥文庫（近世日本文學大家的寶庫。晚年從九州大學退休後執教於關西大學）和增田文庫（近現代中國研究者增田涉的藏書。1931年在魯迅家中單獨受業中國文學史達十個月之久，之後又屢獲魯迅寄贈新著。晚年從大阪市立大學轉來關西大學執教，1977年在其至交竹內好的追悼會上致完吊辭後即不省人事而逝世，成為日本魯迅研究界連喪雙璧的一段痛楚而難忘的記憶）等。關西大學內藤文庫主要為內藤湖南及其長子內藤乾吉的藏書和家族信件。內藤原來收

近年來，關西大學文化交渉學教育研究中心（2007年創立、2012年改稱文化交渉學研究中心）倡導的東亞文化交渉學，伴隨著與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中心、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和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等共同創立東亞文化交渉學會（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簡稱 SCIEA），并每年易地輪番召開年會而名聞遐邇。而鈔本《章氏遺書》的流傳和利用，則可謂近代中日文化交渉史的一段佳話。²⁾

前年以九十一歲高齡去世、有通儒全才之稱的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倪德衛（David S. Nivison 1923-2014）在五十年前出版的大作《章學誠的生平及其思想》一書導言的開頭部分曾對這段佳話作過如下敘述。「自從內藤虎次郎（1866-1934）在1902年首次閱讀了流傳最廣的文集《文史通義》和《校仇通義》以後，章已經開始引起中國和日本學者越來越多的興趣。內藤讓他在日本的朋友留意這些作品，並在此後不久得到了一種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以此為依據，他為章學誠編纂了一個簡要的年譜。這發生在1920年。此後，章開始在他的故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1922年，由胡適編纂的一部更為詳盡的章學誠年譜以成書的形式出版，同年還出版了第一部基本上完整的章氏遺文集。從那時起，中國和日本的研究者開始發表文章討論章的著作和思想的方方面面，或者在有關中國歷史和學術的著作中詳盡地研究他。」³⁾

當時《內藤湖南全集》十四卷（築摩書房，1969年至1976年）尚未出版，這段敘述所依據的是內藤的《研幾小錄》（弘文堂，1928年4月）和《支那史學史》（弘文堂，1949年5月），前者收錄了1920年11月和12月連載於京都《支那學》雜誌第一卷第三、第四號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和1922年5月發表於同一雜誌第二卷第九號的〈讀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後者收入了內藤1928年10月6日在大阪懷德堂所作的講演〈章學誠的史學〉。由於這是倪氏大作中的第一個註釋，特別引人矚目，顯示了冷戰初期歐美學者利用戰前日本積累的研究成果進行中國研究的時代特徵。⁴⁾ 細讀這段敘述，可知其對來龍去脈的介紹較為清晰，不過其中「在此後不久得到了一種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一句，不僅在關於從初讀《文史通義》到購入鈔本《章氏遺書》相距時間的交代上，而且在對於該鈔本性質的理解上，顯然是有誤解和誤譯的。

首先，從1902年初讀《文史通義》到1919年購入鈔本《章氏遺書》相距時間達十七年之久，然而因譯

藏中的幾件國寶級文物，如〈唐寫本說文殘卷〉等，為武田製藥公司所屬的杏雨書屋所藏，還有部分書籍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收藏。最近，內藤湖南三子、已故愛知大學教授內藤戊申的藏書也進入該所收藏。關於關西大學文庫群的詳情，請參見網頁 http://opac.lib.kansai-u.ac.jp/index.php?page_id=17216。

2) 有關東亞文化交渉學會的歷屆年會和英文年刊，詳見網頁 <http://www.sciea.org/>。

3)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倪氏在哈佛師從的中國教員之一洪業先生為之作封面題詞「學際天人 才兼文史」以讚頌章學誠。該書榮獲同年即1966年的儒蓮獎。轉引自楊立華的中譯本（原書為簡體字，本文中改為繁體字），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系列，2007年10月，第2頁。引文中劃線部分的英語原文為“Naito called these works to the attention of his friends in Japan and later obtained a manuscript of a larger part of Chang's writings, from which he prepared a brief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英文原書也為第二頁。

4) 倪氏於1940年考入哈佛本科後不久即應徵入伍，在陸軍日語學校學習後從事日軍密電碼的破譯工作，據云在情報部門期間為賴肖爾屬下。戰後回到哈佛大學也繼續接受賴氏以及費正清和楊聯昇的指導，直至1953年完成關於章學誠的博士論文，1954年馬上由富布萊特基金會資助訪問京都大學一年，其日文水準應該不錯。而眾所周知，賴氏作為傳教士之子出生於東京，並在日本念完高中才去美國讀大學。二戰期間應徵入伍為情報官員，戰後回到哈佛，1960年前期出任肯尼迪政府的駐日大使。

者將“later”一詞譯作「不久」而產生極大誤差。據內藤本人上述數文中的記敘，特別是內藤文庫所藏該鈔本的附屬信件，此鈔本是1919年4月16日由上海英租界的日系會社「樂善堂書藥房」擔任中國書籍販賣的岸田太郎以郵包寄給時在京都帝國大學執教的內藤，信中告知「遵命買下的鈔本章學誠遺書」的目次乃是依照王宗炎（晚年的章氏委託其代為校訂編輯自己書稿的友人）原定編次，但是故意未將已經刊刻的《文史通義》中之各編抄存其中。太郎在信中要價「二百五拾圓」，說是「以今日之困難行情，這已是竭力加以討價還價的結果，如果您萬一不要的話，敬請寄回以便讓與他處」。⁵⁾

這十七年之久的相距時間，意味著內藤對人物研究所持的謹慎態度，即不以其代表作輕易評判，而是耐心收集相關史料以知人論世，務求立論公允而詳實。與內藤的章學誠論相仿的是他的富永仲基論，兩者皆經過十幾年乃至二十幾年的上下求索，等到關鍵史料出現并把握全體概況，水到渠成之後才作出蓋棺定論。⁶⁾

其次，此鈔本乃是孫問清以厚酬聘請的秀才們精心抄校的章氏遺書，而不宜以「一種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相稱。先是作者倪德衛用 manuscript（手稿）而未用 copy（抄本或鈔本）一詞加以形容，導致包括譯者在內的讀者有可能誤解其或是章氏本人的親筆手稿。因為手稿一般表明某稿件用手寫而成，唯抄本才能確然表明其非章氏手書，而是拷貝。又由於譯者沒有充分理解（manuscript）之前所加的不定冠詞（a）的妙處，而將誤解鑄成了誤譯。因為倪氏使用這個不定冠詞，原本是想達到將「是否章氏親筆手稿」的問題加以模糊化的目的，從而在沒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避免做出確定判斷。

內藤湖南1919年從上海樂善堂書藥房購入的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的由來，可以從參與抄寫的金興祥的以下感言得知。金氏是在中日之間從事文物買賣的古董商，曾數次造訪京都市內的內藤家。為投其所好，1921年曾將自己和友人抄寫的章學誠未刊稿三十一篇匯成兩冊進呈內藤，扉頁上有其題詞「辛酉重陽後十日寄贈 湖南先生 秀水金興祥」。後來又當面贈送「小松司馬書畫合錦條幅」，卷軸上的題簽為「湖南先生

5) 見內藤文庫所藏鈔本《章氏遺書》附屬物中的該信件，解讀時得到了杉村邦彥先生的指教，謹此誌謝。據柴田清繼的調查，「岸田太郎は岸田吟香の二番目の弟万三郎の長男である。吟香は1877（明治10）年、精奇水という目薬を販売する樂善堂を東京銀座に開店し、翌年には上海に、さらに1887（明治20）年には漢口にそれぞれ支店を開設した。万三郎の五男完五の息子である岸田準一の回顧するところ（『上海樂善堂の思い出』、『浄世夫彦記念会々誌』6所載）によれば、樂善堂上海店の経営は完五が当たり、太郎は中国書籍の取り次ぎに当たっていた。」（『神戸発行『日華新報』の基礎的考察—明治大正期の日中两国語新聞—」<http://mkcr.jp/archive/041014.html>）。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二百五拾圓」可謂價格不菲，可以由當時書畫古董市場的行情推知。例如，舊拓顏真卿「爭座位帖」值三百金，張照（1691-1745）「論律法疏草冊」值三百六十金、王文治（1730-1802）「臨二王書冊」值百三十五金，姚姬傳（1731-1815）「秋夜七絕草書」值二百金。據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員富田淳「槐安居コレクションと聽冰閣コレクション—高島菊次郎氏と三井高堅氏—」、收入關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研究會編《關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2012年3月。我也在這次國際研討會上作了報告，收入該報告書的論文題為〈大正期中国書画蒐集の指南役としての内藤湖南—その眼識と実践—〉。

6) 陶德民「從中日近世學術尋求〈與西歐神理相似者〉—內藤湖南的章學誠研究對張爾田和胡適等的影響」，臺灣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東亞視域中中國人文學術的傳統與近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2016年8月24日。相關論文參見「內藤湖南の章實齋顕彰に刺激された中国の学者—胡適、姚名達および張爾田との交流について」、收入陶德民《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中国学の始まり—漢字の革新と同時代—》（関西大学出版部、預定2017年3月出版）；「内藤湖南の仲基研究」、收入陶德民《日本漢学思想史論考—徂徠・仲基および近代—》（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十一、関西大学出版部、1999年）。

清賞 金興祥持贈」。⁷⁾ 1922 (壬戌) 年 3 月, 金氏在內藤家中看到成於二十餘年前的這個鈔本時, 不由得情動於中, 感慨萬千。因內藤相勸, 當場在其中自己負責抄寫的第九冊最後一頁寫下感言。

丙申年秋季 諸暨孫問清太史廷翰 以章實
齋先生文稿囑鈔錄一冊 今年春三月
內藤湖南先生出以見眎 始知此全書
歸於 先生鄴架 時隔二十五年 不勝滄桑
之感 特識 歲月壬戌三月 秀水金興祥

該頁欄外, 還有內藤關於當時談話的親筆記錄: 「孫問清爲詁經精舍高材生 金頌清云」。之前的一頁有「是冊託秀水金吉石之世兄頌清所抄 丁酉八日校」一行, 爲總管全書抄校事宜者所寫, 其中「頌清」二字處原爲空格, 以淡墨補書此二字的似爲內藤筆跡。空格之原因, 估計是總其事者書寫時未能記起金興祥的名號。與其他各冊末尾中的類似註記聯繫起來, 可見該書十八冊抄寫校對完畢, 是在1897 (丁酉) 年 2 月。

金興祥 (1878-1941), 名頌清, 金爾珍 (吉石) 之子, 浙江秀水 (今嘉興) 人。少習儒學, 清光緒二十五年 (1899) 補博士弟子員。後致力於經史之學, 對圖書文物的研究有較高造詣, 善鑒真偽。⁸⁾ 「丙申」爲1896年, 當時金氏十九歲。其父金爾珍以從事毛晉「汲古閣」古籍善本的影印而聞名遐邇, 金氏本人自小受到良好薰陶和教育, 雖然三年後的1899年才補博士弟子員, 此時已開始嶄露頭角, 所以會受邀參與此書的抄寫和校訂, 總其事者稱之爲「金吉石之世兄」, 可見周圍士人對他的器重。而金氏也不負眾望, 在科舉制度廢除後的動盪歲月中轉而經商, 1920年代在上海開辦中國書店, 1936年曾在東京開辦古董展覽, 現今日本收藏的不少書畫精品均是所謂「金氏攜來品」或「金頌清氏將來品」。而金氏也有孝心, 於1924年將其亡父金爾珍的墨跡匯集出版了《梅花草堂臨書》。⁹⁾

感言中提及「以章實齋先生文稿囑鈔錄一冊」的「孫問清太史」爲浙江諸暨人, 生於1861年11月12日, 卒於1918年2月27日。其譜名爲起煥, 更名廷翰。號文卿, 又號問清。廩膳生, 光緒乙酉 (1885) 科本省鄉試舉人, 己丑 (1889) 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授職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編書處纂修和文淵閣校理。據《諸暨民報五周紀念冊·人物小誌》記載, 孫氏「沈潛好學, 未嘗鶩聲氣、事標榜。日購求善本, 前後費萬數千金, 購古人書畫費三萬余金。滬上書賈, 盡出其門, 廷翰日夕披覽無倦色。庚子英法聯軍攻北京, 圖籍彝器多毀, 其中《二十四史》尤稱善本。廷翰時方在館, 百計謀之, 得版權, 影印一千冊, 捐入北京大學二十冊, 其餘圖書館、學校復若干冊, 竟以是耗其產。湯壽潛總辦滬杭甬鐵道, 廷翰爲

7) 陶德民《內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内藤文庫所藏品集》(關西大學出版部, 2009年), 91頁。合錦條幅中的畫上有「鄒縣孟廟外兩槐甚古 嘉慶元季十一月圖之 錢塘黃易」之落款。小松爲章學誠的同時代人黃易 (1744-1802) 的號, 司馬之稱乃是因其曾任山東運河同知之故。

8) 據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A2%82%E6%B8%85/5043879?fr=aladdin。

9) 金爾珍 (1840-1917), 浙江秀水 (今嘉興) 人。字吉石, 號少芝 (之), 又號蘇龔, 室名梅花草堂 (有《梅花草堂詩》), 例貢生。工書畫, 精鑒賞。書法鐘王, 尤喜學蘇, 畫山水有宋元風格。亦嗜金石, 善刻印。據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關於「金氏攜來品」, 參見注 5 的富田淳論文。

董事，其後浙江旅滬公學復推為校長，率以循謹稱。樓藜然（號蓄庵）創設諸暨圖書館，廷翰先捐書數千卷”。《諸暨民報五周紀念冊·諸暨社會現象》還有“孫問清太史寓居滬上，購求古書數萬卷。太史既歿，書隨散佚”一段。¹⁰⁾可見孫氏1918年去世以後，其藏書通過其家人之手流入市場。其中一些貴重古籍為嘉業堂主人劉承幹（1881-1963，號翰怡。即倪氏所說在胡適之《章實齋先生年譜》問世同年出版了「第一部基本上完整的章氏遺文集」的劉氏）等收購，而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則為上海樂善堂書藥房岸田太郎買下，之後又為內藤湖南於1919年春天購入，在時間順序上是完全吻合的。

在時間順序上完全吻合的另一個重要事實，是孫問清之所以在1896「丙申年秋季」以章實齋先生文稿囑鈔錄一冊，是因為家居滬上的他於五年前的1891（光緒17）年12月31日（陰曆12月1日），在章學誠族裔章小雅的海寓所見過其所藏的《章實齋先生遺書》抄本三十四冊。當時孫氏三十一歲，兩年前中了進士，可謂新貴。陪同他造訪章小雅府上的晚清文獻學家蕭穆（1834-1904）比他大二十七歲，是海上聞人。幸而蕭氏在其《敬孚類稿》卷九〈記章氏遺書〉留下了這次私家訪書的記錄，使我們得以了解孫問清與《章實齋先生遺書》的因緣。

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晤章氏族裔章小雅處士善慶於上海寓所，小雅好古，藏書頗多。十二月朔日，同諸暨孫問清太史廷翰往訪小雅，觀所藏各古書善本。中有舊鈔章實齋先生遺書三十四冊，云為其鄉人沈霞西家藏本。沈氏藏書數萬卷，約直四萬金，後其人亡家落，多散之揚州等處。此遺書乃留落紹興本城某書坊，以洋銀百元得之。¹¹⁾

文中的沈霞西（1779-1850），名復燾，號鳴野山房主人，是章小雅的紹興同鄉和前輩，聞名遐邇的大藏書家。又據沈霞西族裔沈知方（1882-1940）《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子部·雜家·信摭〉記載，沈氏還從章學誠長子章杼思處借抄過章氏所著《信摭》，書末有其跋語，曰「此冊實齋先生五十七歲以後所記。起乾隆甲寅至乙卯冬竟。復燾於道光戊子夏從其嗣子杼思處借鈔。」¹²⁾因而可以推知，孫問清囑抄的章氏遺書的底本，可能就是他所見過的章小雅購得的沈霞西原藏本。因博學多識的蕭穆稱之為「舊鈔」本，可見也不是章學誠的手稿本。不過，因為章學誠去世時，沈霞西已有二十三歲，且與章氏長子有借抄章氏遺文等交往經歷，他的鈔本應該是比較接近章學誠手稿原貌的善本。¹³⁾

10) 1980年代任諸暨市圖書館長并參與編輯《諸暨縣志》的楊士安先生，於2012年撰有〈孫廷翰簡介〉一文，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731674010143j4.html。

11) 〈蕭穆論章氏遺書〉，《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624-625頁。參見，潘建國〈沈復燾鳴野山房藏書考略〉，《文獻季刊》2008年10月第4期。

12) 轉引自潘建國論文，同注11。關於近代出版界的名人沈知方，近有安徽大學碩士論文《沈知方時期世界書局出版活動特色探析》（2009年）加以探討，作者殷航經與沈氏侄子沈嘉華聯繫，得以推定其卒年。從該論文所引沈知方《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序言來看，鳴野山房之稱似乎並非始自沈霞西，只是在沈霞西時達到巔峰而已。所謂「家本世儒，有聲士林；先世鳴野山房所藏，在嘉道關已流譽東南；霞西公三昆季，藏書之富，尤冠吳越」。

13) 據〈蕭穆論章氏遺書〉即《敬孚類稿》卷九〈記章氏遺書〉，兩人訪書後，蕭穆曾借閱該鈔本并錄其要者四、五冊。而章小雅於次年即壬辰（1892）年9月21日便逝世了，其所購舊鈔章實齋先生遺書歸於其兄章石卿（壽康）。壽康因缺用曾將該舊鈔本和托人錄下的副本質於書肆醉六堂。因聽聞醉六堂主人吳中甫將出售其書，蕭穆費盡周折，從友人周萊仙處借出將副本贖出，并從吳中甫借出舊鈔本，從而完成了校對作業，并擬募資速刊，但是終未實現。不過，其保護

上文提到的劉承幹所刻嘉業堂本《章氏遺書》(1922年)，出版以後好評如潮，其底本則是1917年從德高望重的沈曾植(1850-1922)處借來的。劉承幹《求恕齋日記》1917年8月22日(陽曆十月七日)關於當天午後的造訪有如下記載。

與孫益庵同至沈子培處，談至晚而歸。伊藏有《章實齋全集》稿本，較《文史通義》多出數倍，向未刻過。實齋著述此為最足，益庵勸予刻以行世，予允之。今見子培，伊謂：“此書予向極寶貴，從不假人，今閣下可刊，盡可取去，予不禁為實齋慶也。”¹⁴⁾

將珍藏的《章實齋全集》稿本借給劉承幹的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興人，與金興祥是同鄉，與金氏之父金爾珍是同時代人。光緒6年(1880)進士，歷任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以及上海南洋公學監督。一生藏書頗富，先後積書達三十萬卷，精本亦多，宋槧元刊近百種，方誌和鄉邦文獻百余種，康熙、乾隆刻本為最富，藏書庫有“海日樓”等數處。俄國哲學家卡伊薩林、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以及內藤湖南與之長談後均為其折服，卡氏更著《中國大儒沈子培》一書加以頌揚。沈氏1922年去世後，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在其輓聯中稱之為「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¹⁵⁾筆者曾在相關論文中提到，內藤於1899年初次訪華時已聞得沈曾植大名，1902年11月15日與沈氏作竟日長談後，一再向沈氏請求其《蒙古源流箋証》的抄本，并推測內藤之購入《文史通義》并加以精讀可能與沈氏的推薦有關。

陪同劉承幹求借沈曾植藏《章實齋全集》稿本并極力慫恿其刊行之的孫益庵(1869-1935)，名德謙，晚號隘堪居士，江蘇吳縣人。張爾田(1874-1945)晚年的燕京大學國學院同事和至交鄧之誠在所撰《張君孟劬別傳》曾提及，張爾田「居上海時，與海甯王國維、吳孫德謙齊名交好，時人目為海上三子。國維頗有創見，然好趨時；德謙只辭碎義，篇幅自窘，二者者博雅皆不如君。」1915年前後，沈曾植主持編纂《浙江通志》時，邀請王國維、張爾田等為分纂者。沈曾植於1922年逝世後，張爾田哀其身後遺書零落，便發憤為其校補《蒙古源流箋証》，積十年之功，訂正百數十事，終於1932年將其刊行，并贈送內藤一本。內藤文庫中至今保存著這部「沈曾植撰 張爾田校補」的大作，當時張氏寄贈時的來信，以及經手者、中國銀行大阪支店長戴克諧氏的書簡。¹⁶⁾

劉承幹在出版嘉業堂本《章氏遺書》(簡稱「劉刻」)時，孫益庵和張爾田都應邀撰寫了序言，孫益庵還指導了校勘工作。梁啟超的高足、對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作了訂補的姚明達在新版年譜中把「劉刻」

和彰顯章學誠遺書的功勞極大，令人起敬。因此，孫問清囑鈔的底本為章小雅、蕭穆這一系統的版本，可能性極大。

14)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7年)，455頁。

15) 沈曾植，參見百度百科網頁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88%E6%9B%BE%E6%A4%8D/119017?fr=aladdin>。王國維輓聯引自注14許全勝所撰年譜之自序。

16) 鄧之誠撰《張君孟劬別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資料編輯部主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參見陶德民「內藤湖南における進歩史觀の形成一章字誠『文史通義』への共鳴」，『アジア遊学』第93号，2006年11月。「關於張爾田的信函及「臨江仙」詞一內藤文庫所收未刊書信考證(二)」，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二十八号，2007年3月。從遍佈內藤手澤本《文史通義》、特別時其中的「言公」篇的朱色眉批來看，可以了解到他當初讀此書時的欣喜心情和鑽研精神。

和胡適所作章氏年譜的同年出版作為章氏研究史上的兩件大事。

生平學術始顯於世 民國一十一春（一九二二）（卒後一百二十一年）
章氏遺書劉刻行世 民國一十一秋（一九二二）（卒後一百二十一年）¹⁷⁾

姚氏還對其訂補工作所依據的數種《章氏遺書》刊本和雜誌所載章氏文獻作了如下交代和評論。

- 1 會稽徐氏鈔本，即浙江圖書館排印本。這本的好處是目錄下有注。
- 2 山陰何氏鈔本，即楊見心先生藏本，即馬夷初先生轉鈔本，即杭州日報中國學報印本。這本的好處是編次最有條理。
- 3 劉翰怡先生刻本，據說是據王宗炎所編，沈會植所藏的鈔本，加上庚辛之間亡友列傳，和州志，永清志，湖北志稿，和幾種劄記，這本的好處是收羅得最豐富。
- 4 紀年經緯考。
- 5 此外散見於國粹學報，古學彙刊，禹域叢書，藝海珠塵及其他叢書或雜誌的遺文，也曾參考，不必詳舉了。¹⁸⁾

但是，當姚氏試圖在補訂年譜的同時校勘出一部最為可信的《章氏遺書》文本時，他終不免落入找不到一個鈔本的窘境而有如下遺憾：「劉刻雖博，亦不及廣徵別本。我隨便拿別本來校，除了抄胥手民因形似音近而致誤的文字以外，整段的多寡，整句的異同，兩皆可通的文字，就不知有多少，幾乎沒有一篇全同的。因此我又化了好些工夫，去校勘章氏遺書，不管是單性本，叢書本，雜誌本，只要在北京能找出的，我都找來校過了。北京雖是書籍集中的所在，但我所要找的章氏遺書鈔本一本也不曾看到。（民國）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實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義，便不能不擱筆。八九月裏，所以遠渡東海，浪遊兩浙，不恤金錢和時間，不畏危險和辛苦的緣故，只是要找幾個鈔本看。¹⁹⁾

其實，內藤文庫中保存著姚氏寫於1928年1月11日的信函，其中有如下感言和請求，可見他在半年多以前已經下定決心東渡日本，以便目睹內藤所藏的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并據以校勘章氏遺書。信的後半部分如下。

名達學習 大邦文字過遲 近始能讀
大著 既感
先生治學之勤 益我之厚 又知
先生先我而作史學史也 佩仰之至 三年前立斯志 不

17) 胡適著·姚名達訂補《章實齋先生年譜》（商務印書館，1929年3月）「大事索引」，3頁。其中括號中的公曆年份，為筆者所補。

18) 同注17，9頁。

19) 同注17，4頁。

圖遙與海東 先輩暗合 擬俟
大著出版 當逐翻之 即祈
閱校 以餉弊國後學 其功效當較拙著尤大
耳 名達校讀章學誠先生之書於今三年 尙欲
敬求
寶藏章氏遺書抄本一校 並思得京都某店
朱少白自筆文稿一讀 不知
先生能慨助之乎 抑俟四月來莅遂攜示乎 近來
大著有關於章先生者否 拙著章實齋之史學正
在起草 敬祈
多賜教言 卑免誤解 拙著之已成者甚願寄呈
請教 在今日弊國 欲得一學精路同之先輩如
先生者 上天下地不可得也 故孺慕心仰於
先生爲特深焉 臨啓神馳 佇候明教
內藤湖南先生玉案下 後學姚名達拜啓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姚氏結果是否看到內藤的「寶藏章氏遺書抄本」，已難以核實。內藤文庫中的這封信中又姚氏的名片，是隨信附來的還是訪問內藤時面交的，也無從了解。不過，他和胡適一樣，把自己訂補的胡適章氏年譜寄贈一本給了內藤。

鈔本，特別是內藤所藏的這個鈔本十八冊之所以珍貴，如前所述，不僅是因為其底本是與章學誠長子有交往并借抄過章氏遺文的沈霞西原藏本（後爲章小雅購得），而且是因爲世居上海、家財萬貫的孫問清以厚酬聘請的秀才們精心抄校他自己親眼見過的這個鈔本。據曾任諸暨市圖書館長并參與編輯《諸暨縣志》的楊士安記述，「咸豐八年（1858）“粵匪”竄入浙境，諸暨被蹂躪，廷翰之大父鄂生（1812-1886，即孫維棣）時方治沙船業，出入海上，遂移家上海居焉。父恕齋（1839-1911，即孫光圻）與仲兒子方（1837-1896，即孫光坊）相友愛，聯屋而居，生五子，廷翰其長也。」²⁰「問清既顯貴（指其高中進士一陶），而恕齋益以商業致饒，給世俗所謂富與貴者，問清以年少兼之，宜無不自得者。」²⁰因此，爲得一套精鈔精校的《章氏遺書》，孫問清是不會在意多付一些酬金的。

遍觀十八冊中的相關註記，可知此鈔本的抄寫和校對作業大多是總其事者委託其所信任且有「茂才」（即秀才）身份的士人承擔的，同时也包括金興祥這樣年齡未滿二十的前途有望者（三年後「補博士弟子員」）。聘請他們來做，所付的酬金自然要多，但可以保證抄校的質量和可信度。與此相反，若僱用只識漢字而不諳儒學的「抄胥手民」來做的話，費用可以節省，但抄寫時不免會「因形似音近而致誤」。姚明達所言極是也。

20) 同注10、楊士安〈孫廷翰簡介〉。文中引用《光緒諸暨縣誌·坊宅誌》：「孫翰林故裏，在北門街，光緒己丑進士翰林院檢討孫廷翰祖居。」

姚氏的態度，可以說是繼承了胡適做章氏年譜時的態度。他在序言中寫到：

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

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知道他藏有一部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遺書的目錄全鈔了寄來。那時我本想設法借這部遺書，忽然聽說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鈔本的章氏遺書排印出來了。我把這部遺書讀完之後，知道內藤先生用的年譜材料大概都在這書裏面，我就隨時在內藤譜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得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我那時不過想做一部內藤譜的『疏證』。後來我又在別處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記在一處。批注太多了，原書竟寫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個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譜。這便是我作這部年譜的緣起。

可見在當時《章氏遺書》尚無刊本時，胡適也竭力想讀到內藤所藏的這個鈔本，不僅托人鈔來目錄，而且想目睹其書。好在年譜撰寫途中，浙江圖書館出了排印本，才打消了借閱的念頭。如前所述，在其年譜出版半年之後，劉承幹的吳興南潯嘉業堂刻本也出版了。那時真是一個章氏研究成爲顯學的時代。

關於內藤和張爾田的交往，需要提到後者的成名作《史微》八卷。鄧之誠對此曾作過如下評價，即「本章學誠之旨，求証于群經諸子，窮源竟委，合異析同，以推古作者之意，視學誠爲通類，知方燦然有序，君由是顯名。倭人至列爲大學研文史者必讀之書。」²¹⁾而這一推介，乃出於內藤。內藤因激賞《史微》而屢屢向其弟子門生推獎張氏，內藤文庫中至今保存有數種不同版本的《史微》。²²⁾吉川幸次郎記得內藤稱張氏爲自己的“平生第一知己”，神田喜一郎也回憶說，1926年內藤在與羽田亨編輯《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時因疏忽而未向張爾田約稿，感到頗爲遺憾。之後特意拜託，遂將其《真誥跋》一文收入1930年由西田直二郎編輯出版的《內藤博士頌壽記念史學論叢》。在收到此書後，張爾田在回函中寫下如下謝辭。²³⁾

湖南先生有道 一昨由弘文堂寄到承賜史學
論叢・華甲壽言各書，並書示 嘉章，祇領感
謝。區々不腆之文。荷
先生獎納，汗顏無地。惟益祝
先生神明湛固，永爲吾黨泰斗耳。田年二十餘與

21) 同注16，鄧之誠撰《張君孟劬別傳》。

22) 《史微內篇》四卷本，爲《多伽羅香館叢書第一種》，目錄末尾有出版緣起，爲“辛亥季春山陰平毅劫剛”所記，劫剛稱張爾田爲“姨丈”；八卷本，也爲《多伽羅香館叢書第一種》，目錄末尾也有出版緣起，爲“壬子先立夏三日東蓀”所記，東蓀稱張爾田爲“兄”。可見二者都是張爾田的親戚。

23) 《內藤湖南博士》、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Ⅰ・先学を語る（1）》（刀水書房、2000年），96-97頁。參見陶德民「內藤湖南における進歩史觀の形成一章学誠『文史通義』への共鳴」，《アジア遊学》第93号，2006年11月。

孫隘堪同學，得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好之。彼時
國內學者頗無有人注意及之者，而豈知
先生於三十年前在海外已提唱此學，且於竹汀・東
原諸家，無不博采兼取。覃及域外，較諸實齋
更精更大。即以文藝論淵雅適逸，亦遠在北宋之
上。此非田一人之私言，實天下之公言也。²⁴⁾

此處再錄張爾田1934年所寫的七律詩〈敬挽內藤湖南先生〉一首，以資紀念內藤誕辰一百五十年。詩中把內藤和八年前（實為七年又二十四天）逝世的王國維一併視為當代東方文獻學的兩大家而認為後來恐無來者，雖有過譽之處，確也是基於東亞視野的一個重要看法。

頻年問訊到東鄰，縞紵西洲有幾人？君贈詩有“一時縞紵遍西洲”句
耆舊凋零三島盡，黃農綿邈百家陳。
論文久失方聞友，易簣驚傳老病身。
莫怪襄翁雙泪眼，觀堂宿草墓門春。

靜安歿已八年，君又繼之，東方文獻之寄無人矣，故末句及焉，非獨哭其私也。

敬挽 內藤湖南先生 張爾田稿奉²⁵⁾

又及，關於倪德衛在其大作中曾將其與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和意大利哲學家維科（G. Vico 1668-1744）相比的章學誠，戰後的京都學派東亞史學者在研究方面又有新的推進。1989年，即關西大學購入內藤文庫後不久，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便將堪稱其鎮庫之寶的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縮印了一套。²⁶⁾ 研究成果方面，已經刊行的有山口久和《章学誠の知識論》（創文社、1998年），并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收錄的〈六經皆史說的系譜〉（原載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年）等。該所於2015年4月又啓動了一項三年研究計劃，課題名稱爲「《文史通義》研究」，旨在通過會讀，從文獻學、史學、文學和思想史等方面作深入探討，并對其中的內篇加以詳細譯注，刊載於該所的《東方學報》。研究班負責人爲古勝隆一，成員有井波陵一（所長）、岩井茂樹、永田

24) 參見陶德民「關於張爾田的信函及「臨江仙」詞—內藤文庫所收未刊書信考證（二）」，關西大学『中国文學會紀要』第28号，2007年3月。又及，從遍佈內藤手澤本《文史通義》、特別時其中的「言公」篇的朱色眉批來看，可以了解到他當初讀此書時的欣喜心情和鑽研精神。

25) 錢婉約・陶德民編《內藤湖南漢詩酬唱墨迹輯釋—日本關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藏品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9月，122-123頁。內藤卒於1934年6月26日，王國維卒於1927年6月2日，故曰實爲七年又二十四天。

26) 《章氏遺書三十卷》，索書號爲京大人文研〈東方叢-VI-6-25-A-1〉。書誌信息見日本全國漢籍數據庫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19705/taggedCard/8706482.dat&back=1>。

此景印本僅製做了一套，裝訂爲六冊。是以A4紙涵蓋左右兩頁，尺寸較小。且是黑白的，未將內藤的墨色評點和硃批以原樣呈現。這些不足都將在本書中得到改善和克服，值得慶賀。

知之、藤井律之、土口史記和小林隆道等，可謂人才濟濟，成果可期，令人鼓舞。²⁷⁾

2016年12月31日定稿

後記 本文的草成，乃是因為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先生的好意。黃先生擬在近期內將內藤文庫所藏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冊加以套色景印，分作四卷，作為該院《東亞儒學資料叢書》的一種。文章原來題為〈鈔本《章氏遺書》景印弁言〉，加以修正後，現改為〈關於內藤文庫所藏鈔本《章氏遺書》來歷之考證〉。謹此致謝。

2017年1月31日

27) 參見該所相關網頁 <http://www.zinbun.kyoto-u.ac.jp/kyodokenkyu/bunshitsugi.htm>。

